

## 綏東戰役再探

### —兼論中共的解釋觀點—

張力\*

### 一、前言

一般而言，第二次中日戰爭起自民國26年爆發之「盧溝橋事變」，至34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共歷經八年歲月，但在盧溝橋事變以前，中日雙方已發生過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如21年的淞滬戰爭和22年的長城戰役。是故有些研究抗日戰史的學者，就把第二次中日戰爭起始點定在民國20年的「九一八事變」，有關此一分期的問題雖也引起討論，但未造成爭辯。較為謹慎的學者不會忽略盧溝橋事變以前的中日衝突，有些史家逕自名之為「抗戰前的序幕戰」。<sup>(1)</sup>

(1) 早期出版之吳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台北，綜合月刊社，民國62年5月）及最近出版之李雲漢著盧溝橋事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76年9月），均有甚多篇幅討論盧溝橋事變前的中日衝突。劉鳳翰則有專文「抗戰前的序幕戰」討論，收於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集（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4年9月），頁537-603。

發生於民國25年11月的綏東戰役，戰史通常稱之為「百靈廟大捷」，基本上這場戰役並非中日兩國軍隊的正面交鋒，而是傅作義所部綏遠守軍，擊潰具有獨立傾向的內蒙軍隊之侵襲。學者在處理抗戰前的序幕戰時，通常會把此一戰役列入，主要是因為內蒙偽軍的背後，是日本帝國主義，特別是入據我國東北的關東軍所支持。因此綏東大捷可以視為「名為安內，實係攘外」的戰役。

率領35軍官兵締造大捷的傅作義和其他幾位將領，在當時被譽為民族英雄，受到各界的尊敬和崇拜。民國38年傅作義任華北剿匪總司令，因戰局逆轉，傅氏竟然與中共協商「和平解放」故都北平，其後出任中共政權部長之職，其餘原35軍將領也因「起義有功」，謀得一官半職；然國內學者在論述抗戰歷史時，並未抹煞彼等在綏東戰役之貢獻，倒是中共史學家為貶損國民政府的抗戰決心和領導地位，乃陸續刊印若干憶往或學術著作，一則凸顯這些將領之功績，另則有意點出中共在當時也會發生某些作用。由於近年來中外文資料相繼出版，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其中問題。因此本文之作，除對此一「五年來中國的首次攻擊」<sup>(2)</sup>之抗戰前序幕戰再加探討，另根據相關史料，歸納中共研究抗戰史之學者襲用的模式，並予以駁正。

## 二、戰前形勢

### (一) 中日對峙局面

民國20年9月，日軍在瀋陽發動攻勢，不久東北即告淪陷，次年3月「滿洲國」宣佈成立。此時日本關東軍並不滿足，乃藉口「對俄作戰準備之際，無後顧之憂」，及一旦發生戰事，可專心一意遂行作戰，因而希望在華北和蒙疆成立「親日之『滿』政

<sup>(2)</sup>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660。

權」。<sup>(3)</sup>遂於22年3月進攻熱河，佔領熱河後又越過長城繼續南侵，迫近平津。中國守軍雖曾於長城各隘英勇抵抗，但因實力懸殊，無法遏阻日軍瘋狂進攻。國民政府只得派黃郛北上交涉，於5月31日簽訂塘沽協定以保存平津。由於協定內容不妥之處甚多，為以後中日兩國在華北的爭端，帶來了隱憂。<sup>(4)</sup>

日本關東軍的攻勢雖因塘沽協定的簽訂而暫時停止，但日本在華北扶植親日政權的野心，並未因此中斷。是時日本的齋藤實內閣和岡田啟介內閣，本有染指華北的意圖，再由軍事和外交兩方面相互配合，伺機向國民政府施加壓力。日本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不時發動挑釁，意圖擴大事端，但國民政府基於「安內先於攘外」的考慮，往往不得不屈從日本的無理要求。24年1月，日本關東軍攻擊熱察邊境中國駐軍，迫使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和日方舉行「大灘會議」，強佔察省境內長城以東土地。5月又藉「河北事件」，向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提出撤退中央軍及第51軍、國民黨黨部停止活動、取締反日團體及其活動等要求，中國只能全部接受，日方稱此即為所謂的「何梅協定」。6月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再藉「張北事件」，迫使察省主席宋哲元去職，續又壓迫察省代理主席秦德純與之簽訂「秦土協定」，根據此一協定，中國駐軍撤出張北以北地區，中國政府不得向察北移民，國民黨黨部自察省撤退，並禁止察省境內之反日組織及其活動。是故日本軍方憑其特務人員的威脅與壓迫，完成其從冀察兩省「驅逐國民政府勢力」的計畫。<sup>(5)</sup>

國民政府雖然一再退縮，但日本仍不滿足，因其原擬計劃，

<sup>(3)</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關東軍作戰(一)：九一八事變與關東軍，日本對華作戰紀要叢書(13)（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7年6月），頁191。

<sup>(4)</sup> 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民國73年10月），頁186。

是要繼偽滿之後，再度建立親日的傀儡政權。24年10月，日本關東軍根據軍方所訂成立「華北防共自治委員會」之計畫，開始威逼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等，籌開所謂「自治會議」，宋哲元等不為所動，蔣委員長亦屢次去電規戒勉勵，日方限宋哲元於11月20日以前宣布成立「華北新組織」，終告失敗。土肥原賢二只得於11月20日嗾使身兼薊密、灤榆兩區行政督察專員之殷汝耕，在通縣宣布成立所謂「冀東防共委員會」，國民政府除立即明令通緝殷汝耕、任命宋哲元為冀察綏靖主任，復於12月11日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應付華北特殊局面。<sup>(6)</sup>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於敵手，對國民政府聲望可謂一極大打擊，但22年之長城浴血抗戰，亦無法阻止日軍「狂奔」至平津，顯示中國之軍事抗敵仍有一段距離。是故國民政府一面進行安內政策，對日關係則力求隱忍，盡可能以外交方式解決。因此華北雖是危機重重，國民政府也屢作讓步，中日雙方畢竟保持了對峙局面。

## （二）內蒙自治運動

華北的出現傀儡組織，可說是日本軍方一手所造成；而內蒙之脫離中央舉動，卻是其本身所醞釀的自治運動，受到日人利用所致。

內蒙古自治運動的起因，據札奇斯欽分析，大致為蒙古人內在的矛盾、外來政治力量的衝擊，和經濟上的死結等三個項目；<sup>(7)</sup>而這三個因素都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二十世紀初期，漠南

<sup>(6)</sup> 見李雲漢，盧溝橋事變，頁24-28，及李雲漢，「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華北的侵略」，收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四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10月），頁119-20。

<sup>(7)</sup>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頁29-32。

蒙古因受中國內地現代化運動的影響，由喀拉沁王貢桑諾爾布展開革新的措施，使內蒙逐步走向現代化，卻也導致新興知識分子與保守分子之間的摩擦。就中央與內蒙關係而言，清末與民初均維持內蒙盟旗的組織。到民國17年北伐成功，中國國民黨雖然秉持孫中山先生「對國內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的號召，但並未制定一套具體化的政策。國民政府反而為鞏固邊防及開發邊疆，將熱、察、綏和寧夏、青海改建行省，內蒙古各盟旗陷於不安。為了與中央進行交涉，蒙古各盟旗長官組織的赴京蒙古代表團，竟與國民政府內前內蒙古國民黨人形成對立。因此國民政府為解決紛擾中的蒙古地方行政制度問題，並調整省縣與盟旗關係起見，於民國19年夏在南京召開蒙古會議，通過「蒙古盟部旗組織法」，次年公佈實施。但保守派認為蒙古王公的原有權益未獲保障，而各省政府亦不尊重此項法律，令蒙古新舊兩派均感失望，只得另尋其他途徑解決。<sup>(8)</sup>

外來力量衝擊方面，先是蘇聯運動外蒙古獨立，其勢力往南延伸，引起日本的疑懼。日軍認為「九一八事變」之後，「蘇聯特別和外蒙緊緊結在一起，並對內蒙古也加深其關心，於是於1934年間，據說對蒙疆王族間施以懷柔政策而加強滲透。」<sup>(9)</sup>基於防備蘇聯的考慮，甚至在日俄重啟戰端時，能立即經由蒙古出擊蘇俄，<sup>(10)</sup>日本都必須完全掌握外蒙古。因此日軍在佔領東北及東部內蒙的熱河後，下一目標即為西部內蒙。國民政府對日本的侵略行動無能為力。為加強與日本周旋的力量及抗拒傅作義的

<sup>(7)</sup> 札奇斯欽，「三十年代的蒙古——從蒙古人的觀點看蔣中正先生與蒙古」，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印，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75年12月），頁301。

<sup>(8)</sup> 同註7，頁300-2；另見李雲漢，盧溝橋事變，頁33-4。

<sup>(9)</sup> 關東軍作戰（一），頁195。

<sup>(10)</sup> 張韜，蒙古問題新認識（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7年3月），頁178。

綏遠省政府行政措施，蒙古各旗遂有意聯合一起行動。

另在經濟方面，民國以來，政府鼓勵關內居民赴邊外開墾，此舉雖能「借地養民」，但直接威脅到蒙古牧民賴以維生的牧場。此一問題，中央之構想也有其道理，如汪兆銘就曾指出：「內蒙同胞還多是以游牧為生，游牧是需要極廣闊的土地的；今日世界最要緊的經濟原則，要以較小的土地，養最多的人，而游牧民族適得其反；故蒙古之生產方式，實在有改變之必要。」<sup>(11)</sup>歷史學者李雲漢也認為「移民屯墾基本上不錯……內蒙同胞不可能停頓在游牧時代……怎麼樣能夠脫離游牧方式，改善生活，這是政府的方向。」<sup>(12)</sup>計畫之安排與執行是否經過周詳考慮，值得吾人再加探討，但在當時篤守傳統生活方式的蒙民，對於政府現代化的措施，顯然不能接受。

內蒙雖在民國17年即開始醞釀自治，但直到22年夏，錫林郭勒盟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簡稱德王），召開兩次百靈廟各盟旗代表會議，方將自治運動帶入高潮。第一次會議於7月26日召開，27日發出要求中央許可內蒙高度自治的通電。第二次會議於10月召開，除再度發出要求自治呈文通電，另通過「自治政府組織大綱」。其中第36條之規定為「本組織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似乎顯示內蒙自治政府的成立無需中央政府之核准。<sup>(13)</sup>而在此同時，日軍先利用投降受編的蒙人李守信攻佔察東重鎮多倫，關東軍且於此設立特務機關；繼於7月由關東軍參謀部提出一份「暫行蒙古人指導方針綱要案」，欲誘使西蒙人民「自決」以轉向「親滿親日」的道路。10月關東軍駐承德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提出一份「建設蒙古國之意見」，以西蒙三盟、察哈爾八旗及歸

<sup>(11)</sup> 方範九，蒙古概況與內蒙自治運動（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3年12月再版），頁82。

<sup>(12)</sup> 見札奇斯欽一文之討論部分，李雲漢先生發言，頁324。

<sup>(13)</sup> 盧明輝，蒙古「自治運動」始末（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1月），頁28-38。

化土默特部、察哈爾的原口北道和山西省的原雁門道各縣，為「蒙古國」的範圍，其「元首」稱為「可汗」，而由日人擔任「指導官」。<sup>(14)</sup>內蒙各盟旗此時所進行雖然為一單純的自治運動，但日軍已在計畫如何加以利用，使其能脫離中國。

國民政府並不反對地方性的內蒙自治，<sup>(15)</sup>但22年9月通過之「自治政府組織大綱」中，雖表明內蒙政府之國際、軍事及外交事項由中央處理，其它行政則由自治政府之法律命令行之（第三條），但整個大綱似有不經中央核定即可施行的態度，於中央威信有損；而日本在華北的種種行動，也令國民政府格外警惕。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隨即召開多次會議，討論內蒙自治問題，並派大員赴蒙進行溝通。幾經磋商，在蔣委員長「力主容納……並認為只有寬放的自治政策，方可以相當的應付邊疆問題」<sup>(16)</sup>之原則下，內蒙於23年4月24日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蒙政會），以雲端旺楚克等24人為委員，雲端旺楚克為委員長，索諾穆喇布坦、沙克都爾札布為副委員長。但因這三人都已年老多病，真正掌握蒙政會實權的是秘書長德王。<sup>(17)</sup>

蒙政會的成立，顯示中央與內蒙關係趨於穩定，而且防制或緩和了日本勢力入侵內蒙。<sup>(18)</sup>但兩年之後，德王終於進行「蒙古建國」的獨立運動，其轉變原因，一是因為蒙政會在政治與經濟上與綏遠省政府時發生衝突，一是日本關東軍積極介入所致。有關前一原因，札奇斯欽論文曾有詳細之分析；至於後一原因，該文亦曾提及若干，但主要仍歸咎於傅作義與德王不睦。<sup>(19)</sup>如

<sup>(14)</sup>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頁34-6。

<sup>(15)</sup> 盧明輝，蒙古「自治運動」始末，頁28。

<sup>(16)</sup> 蔣中正，「中國之邊疆問題」，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60年8月），卷12，頁108-9。

<sup>(17)</sup> 盧明輝，蒙古「自治運動」始末，頁34-6。

<sup>(18)</sup>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頁38。

<sup>(19)</sup> 札奇斯欽，「三十年代的內蒙古」，頁307-11。

前所述，日本對於內蒙早有企圖，德王雖對日本懷有戒心，但也想藉日人力量，來提高內蒙地位，所以並未回絕日本關東軍贈予的槍枝。<sup>(20)</sup>蔣委員長對於德王頗為器重，也不時撥予經費、武器，協助解決問題。<sup>(21)</sup>但在民國24年，日軍為配合其侵略內蒙的計畫，開始積極拉攏德王，德王四周幕僚如吳鶴齡等也趁機獻策，促使德王於24年12月前往偽滿新京和日本關東軍進行所謂「日蒙合作的計畫」。雙方商談結果，日本幫助德王在內蒙西部地區蒙旗先搞一個「獨立」局面，然後再建立獨立的「蒙古國」，並答應德王以蒙古軍總司令部以財力援助。<sup>(22)</sup>25年2月，「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改年號為成吉思汗紀元，5月籌開蒙古建國委員會，成立蒙古軍政府，並積極擴充軍備。<sup>(23)</sup>但因蒙古各盟旗意見不一，尚無正式獨立，脫離中央的明顯舉動，是故

<sup>(20)</sup> 盧明輝，蒙古「自治運動」始末，頁99。

<sup>(21)</sup> 同註20，頁15-6, 77, 82-3。

<sup>(22)</sup> 有關這前後成立的兩個組織名稱，史料有不同的記載。根據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二)，頁216-20所載，「蒙古軍政府」約於25年1月成立，而在6月成立「內蒙自治政府」。但盧明輝一書所記，德王於24年冬在蘇尼特右旗，向日本關東軍派來之田中隆吉提出成立「蒙古軍總司令部」，田中隆吉則主張成立「蒙古軍政府」，而德王堅持己見。「蒙古軍總司令部」遂於25年2月12日正式成立，然趕來參加典禮的關東軍西尾參謀長在代表關東軍司令致祝辭時，仍是只提到祝賀「蒙古軍政府成立」。後來吳鶴齡向德王建議：「既然日本關東軍喜歡『蒙古軍政府』這個名稱，我們就成立『蒙古軍政府』吧，何必非強調叫『蒙古軍總司令部』不可呢？弄得名稱上下不一致。」德王徵求其他人意見後，終於首肯。「蒙古軍政府」遂於25年5月12日在額爾德木索雅勒圖浩特（即德化市，原為察哈爾省化德縣）正式成立。見盧明輝，蒙古「自治運動」始末，頁101, 108-9, 125, 132。盧著主要根據德王之回憶文稿「偽蒙古軍政府成立經過」，其說似較為可信。

<sup>(23)</sup>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二)，頁219-20。

國民政府也未立即展開討伐。閻錫山於11月3日建議如德王宣佈獨立，「再由政府下令較為有詞」，<sup>(24)</sup>但到了11月13日，德王所部偽蒙軍王英部在日軍軍官指使下，向綏遠陶林縣之紅格爾圖進攻，爆發了「綏東戰爭」。蔣委員長立即下令傳作義「向百靈廟積極佔領，對商都亦可伺機進攻。」翁文灝則擬電覆德王，望其「幡然憬悟，一本初衷，取消自署之名義，一切仍當用命中央。」<sup>(25)</sup>此時國民政府已決定採恩威並濟方式，解決內蒙問題。

### 三、寓攘外於安內的戰爭

#### (一)雙方兵力部署

內蒙軍隊以德王所部為基礎，後再結合李守信所部偽軍，並收容華北和內蒙的零星部隊與匪徒，組成蒙古軍。以德王為總司令，李守信為副總司令。在綏東戰役爆發時，內蒙軍之配置及兵力數目如下：

第一軍：軍長由李守信自兼，駐張北。直轄部隊砲兵團駐張北，第一、二師駐商都，第三師駐寶昌，第四師和騎兵第四師均駐張北。共約六千人。

第二軍：軍長由德王自兼，駐德化。砲兵旅及第五、六師駐德化，第七師駐百靈廟，第八師駐馬群。共約六千人。

大漢義軍：原為第三軍，總司令王英，副總司令雷中田、張慶雲、駐商都。其所屬一個師及騎兵第一、二旅，步兵第一旅均駐南壕塹，步兵第二旅駐張北，獨立騎兵師駐尚義。共約六千人。

另有駐紮張北的興亞軍和散駐各地的蒙古保安隊，約二千人。總計內蒙軍隊約二萬人。<sup>(26)</sup>

<sup>(24)</sup> 同註23，頁228。

<sup>(25)</sup> 同註23，頁228-9。

<sup>(26)</sup> 現代史資料(8)：日中戰爭一（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頁590-2。

飛機大砲掩護下大舉進攻，遭守軍擊退。15日晨，日本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和大漢義軍總司令王英親自指揮石玉山、楊守成兩個騎兵旅，金甲三步兵旅，配合偽蒙騎兵第三師尹寶山部，共五千餘人再度進攻，亦未得逞。傅作義也親來集寧指揮，決定採秘密迂迴，包抄王英設在紅格爾圖東北土城子的指揮部。董其武所部於18日凌晨突擊成功，紅格爾圖守軍也趁勢出擊，國軍乃大獲全勝。之後傅作義決定先發制敵，續攻德王主力所在的百靈廟。由孫蘭峰、孫長勝分任正副指揮，各部於11月23日下午行動，祕密接近百靈廟，經一夜之戰鬥，於次日上午收復百靈廟。12月3日日籍指揮官勝島角芳和王英所部副司令雷中田率日偽軍步騎兵四千餘人向百靈廟反撲，亦未成功，雷中田反遭擊斃。12月7日及8日，駐守大廟之王英部石玉山旅、金憲章旅將小濱大佐等29名日本顧問官全部擊斃，並將蒙古軍第七師穆克登寶殘部數百人全部繳械，率部投誠。12月10日李思恩團進駐大廟，20日王英部安華亭旅、王小佟旅在南壕塹率軍反正。<sup>(35)</sup>傅作義部進展順利，似可繼續追擊。日本關東軍未料到偽軍竟然一敗塗地，對此「問題的發展和如何圓滿自我下台頗感頭痛」，<sup>(36)</sup>這時正好發生西安事變，傅軍始未再追擊。

#### 四、中共的解釋觀點

綏東戰役的獲勝，不僅是傅作義和參與戰鬥所有官兵無上的榮譽，也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一項特殊成就。後人撰寫史書時，對內蒙和綏遠當局衝突的原因，雖有不同的看法，但對戰役本身，都予以肯定的評價。中國大陸出版的史料和史書也不會忽略此事的記載，而稱之為「綏遠抗戰」，況且身歷此役的將領日後多已投共，因此中共便以另一套解釋觀點，來看這場戰役。

<sup>(35)</sup> 董其武，戎馬春秋，頁85-104。

<sup>(36)</sup> 關東軍作戰(一)，頁196。

綏東戰役發生時，中共正受到國軍的圍剿，輾轉退入陝西境內，力求自保唯恐不及，遑論對此戰役發生積極作用。不過中共總會藉兩件事情來強調其與綏東戰役多少有點關係：一是25年11月中共中央派彭雪楓攜毛澤東信函，「秘密來到綏遠，鼓勵傅要順乎民心，救亡圖存，以東北淪喪為殷鑒。傅表示決心，不計任何犧牲堅決抗日，絕不做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sup>(37)</sup>此事是否真確，有待考證，不過中共顯然有意自抬身價，暗示隨即爆發的綏東戰役是由中共促成的。另一則為我軍在紅格爾圖戰勝之後，毛澤東和朱德於11月21日代表中共和紅軍向傅作義拍發賀電，以及陝北發起募捐援綏的活動。另外毛澤東派南漢宸攜其親筆賀信及繡有「為國禦侮」四字的錦旗一面來綏。<sup>(38)</sup>綏東大捷傳出，各方賀電無數，國民政府亦慰勉有加，各方也紛紛捐輸，中共既然標榜抗戰，有此錦上添花的舉動，自然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實中共仍是藉此說明「國民政府不抗日，只有中共才抗日」的老問題。國民政府在1930年代初期對日力求隱忍，卻儘可能為抗戰作最充分的準備。這種做法在當時未能獲得部分國人的諒解。有關此一問題，已有學者專文就國民政府所面對的全盤局勢加以討論，<sup>(39)</sup>本文不擬贅述。由於中共一味指責國民政府不抗日，因此大陸出版有關綏東戰役的史籍，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如下的說法：「傅作義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和全國人民救亡運動的推動下，奮起抵抗。」「由於各種複雜因素，蔣介石對綏遠抗戰，既未積極支持，也未阻止破壞。」<sup>(40)</sup>「蔣、閻出於勝敗諉諸地方，勝則歸功於自己領導有方，敗則歸罪於傅作

<sup>(37)</sup> 董其武，戎馬春秋，頁90。而潘紀文在「跟上時代的步伐」一文中，記道攜信前來的是南漢宸，見傅作義生平，頁42。

<sup>(38)</sup> 孫卻非，「傅作義與綏遠抗戰」，王維禮主編，中國現代史大事紀事本末（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778。

<sup>(39)</sup>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頁41-97。

<sup>(40)</sup> 孫卻非，「傅作義與綏遠抗戰」，775。

就戰力而言，李守信所部成軍較早，且有實戰經驗，王英所收羅者，多為原方振武、孫殿英、劉桂堂的殘部，及一些土匪，素質最差。其它由內蒙青年組成的部隊，訓練和實戰經驗均感缺乏。<sup>(27)</sup>但是內蒙軍中，已有不少日本軍官，負責訓練指揮。綏東戰役發生後，一位偽蒙將領率領部下殺死四十名日籍軍官、技師及無線電操作員，然後反正。他在接受一名美國記者訪問時指出，進攻綏遠的計畫，全由日本關東軍策劃、襄助，王英部隊中約有二十名日本軍官，德王所部約有一百，而李守信部隊中，除李本人外，其餘軍官全為日人。<sup>(28)</sup>不過戰前傅作義已透過綏遠省政府駐張家口辦事處主任劉雲峰，策反王小佟、金憲章等偽軍，並設法監視和限制日本特務行動。<sup>(29)</sup>宋哲元的29軍也趁王英招募軍隊時，派遣大批人員混入。這批人員在戰爭爆發時，發生極大作用。<sup>(30)</sup>

國軍方面，傅作義所屬的第35軍為主力部隊，另有晉軍三個師。其中駐守沿包頭至百靈廟一線的是王靖國的第70師和孫長勝的騎兵第二師，駐守綏遠一帶的是傅作義自兼師長的第73師，駐守集寧平地泉一帶、陶林、紅格爾圖、興和等地，有李生達的第72師，李服膺的第68師，孫楚的第101師，周代的砲兵1師，彭毓斌的騎兵第一師。<sup>(31)</sup>至於中央軍是奉命參與此役，曾引起各種猜測，將在下節詳加討論。

## (二) 戰爭經過

民國24年12月，內蒙開始醞釀成立軍政府之時，關東軍即支

<sup>(27)</sup> 同註26，頁592，另見潘紀文，「跟上時代的步伐」，收於傅作義生平（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6月），頁43。

<sup>(28)</sup> U. 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 China 1911-1941（以下簡稱 USMIR, China 1911-1941），Reel 10, No. 0492, p. 6。

<sup>(29)</sup> 董其武，戎馬春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8月），頁88。

<sup>(30)</sup> 盧明輝，蒙古「自治運動」始末，頁153。

<sup>(31)</sup> 現代史資料（8）：日中戰爭一，頁592。

持偽蒙軍李守信部攻佔察北沽源、張北、寶昌、康保、商都、化德等六縣，察省錫林郭勒各旗完全與長城線內隔絕。25年5月蒙古軍政府成立後，偽蒙軍不斷騷擾綏遠守軍；7月，偽邊防自衛軍司令于志謙、副司令馬龍，偽西北防共自治軍司令王道一，先後率本部人馬共四千餘人，進犯綏東紅格爾圖。傅作義親赴集寧，指揮218旅許書庭團及彭毓斌騎兵師一部，大敗偽軍，斃敵三百五十餘人，並俘馬龍等六十餘人。<sup>(32)</sup>8月4日偽軍再分兩路進攻陶林和集寧，也遭擊潰。<sup>(33)</sup>這可說是綏東戰役的序幕戰。

其後二月綏東前線戰雲密佈，偽蒙軍隊調動頻繁，但並未發生戰鬥。待進攻綏遠的軍事佈署就緒後，德王自任為自此進軍的蒙古軍總司令，卓特巴扎普為副總司令。兩人又以察境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正副委員長名義，於11月5日向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發出通電，表示內蒙在綏遠壓迫之下「已退無可退，群衆訴諸武力，以爭最後之生存」。對此一宣戰性通電，傅作義於8日電覆，針對德王所提之綏遠特稅劈分、西公旗事件、百靈廟軍隊譁變、綏蒙易制、及分治問題，作一解釋，另希望德王「擺脫現狀，不受利用，翻然有所表現。」蔣委員長也電致察境「蒙政會」，勸告德王「務希多以國家前途為重，即日停止軍事衝突，聽從中央處理。」。德王對此二電並未回覆，認為準備妥當，且有日本飛機助戰，遂於11月中旬大舉進攻綏東。<sup>(34)</sup>

綏東戰爭的主要戰役有二：一是11月13日至18日的紅格爾圖戰役，另一是11月23日至24日的百靈廟大捷。紅格爾圖是綏遠陶林縣的一個村鎮，西距縣城160里，南距集寧180里，東距偽蒙控制的商都僅60里，為商都入綏必經之孔道，頗具戰略地位。11月13日晚，守軍即由商都進犯的偽軍發生戰鬥，14日偽軍千餘名在

<sup>(32)</sup> 董其武，戎馬春秋，頁90-1。

<sup>(33)</sup> USMIR, China 1911-1941, Reel 10, No. 0444, p. 4。

<sup>(34)</sup> 盧明輝，蒙古「自治運動」始末，頁146-51。

義處理不當，那時可以按地方事件犧牲傅作義向日本帝國主義塞責這樣一個卑鄙目的，勉強同意了傅的主張。」<sup>(41)</sup>或是「傅作義將軍滿懷愛國熱情，不顧國民黨『先安內後攘外』的反動政策和『聽從國際裁決』、『善鄰和好，不輕啟戰端』的侈談，毅然出師，取得赫赫戰果……」<sup>(42)</sup>由此說明傅作義對偽蒙宣戰，不僅是受中共主導，也是反擊國民政府當時的政策。我們若從相關史料來看，國民政府對此戰役，不僅積極支持，且具有主導作用，而傅作義之行動可以說完全配合中央的指示。早在24年後半年25年前半年，日本積極協助內蒙建立軍政府，擴充軍備時，宋哲元、傅作義、戴笠、陳誠、閻錫山、白雲梯等人就不斷電呈蔣委員長，報告內蒙情勢之最新發展及擴軍情形。<sup>(43)</sup>中共資料亦指出「綏遠的具體情況也使蔣介石意在一戰。」<sup>(44)</sup>25年秋在洛陽舉行軍事會議時，傅作義向蔣委員長和閻錫山匯報綏遠形勢，「取得了蔣介石『不亢不卑，相機應付』的默許，並允許派湯恩伯的十三軍、門炳岳的騎七師加強綏遠防務。閻錫山亦允許傅作義指揮王靖國和趙承綏的部隊。」<sup>(45)</sup>傅作義本人的記載也指出，25年8月上旬他向蔣委員長閻副委員長報告綏遠情勢後，旋奉閻電：「指定19軍（王靖國部）在晉部隊（該軍原有四個團在綏）及68師（李服膺部）並獨立第7旅（馬延守部）、獨立第8旅（孟憲吉部）、砲兵四個團為先遣入綏增加挺戰之部隊；爾後，視情況之必要，凡屬晉省軍隊，全數入綏挺戰。」<sup>(46)</sup>68師一部先行開綏，其餘部隊分駐晉北及大同附近集結，由傅隨時調用。<sup>(47)</sup>

<sup>(41)</sup> 董其武、孫蘭峰。「一九三六年綏遠抗戰始末」，綏遠抗戰（內蒙古文史書店，1986年12月），頁55。

<sup>(42)</sup> 董其武，戎馬春秋，頁85-6。

<sup>(43)</sup>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頁216-9。

<sup>(44)</sup> 祝福，「中國人民抗日的先聲」，傅作義生平，頁179。

<sup>(45)</sup> 潘紀文，「跟上時代的步伐」，傅作義生平，頁42。

<sup>(46)</sup> 傅作義，「綏戰經過詳記」，綏遠抗戰，頁3。

由此可見，中央盱衡局勢，本就有意開戰，甚至委諸傅作義全權處理，決非勉強同意。至10月21日，蔣委員長指示閻錫山準備綏遠作戰：

默察情勢，綏遠敵在必得，且預料其攻綏時期，當不出下月初旬，我軍不如趁敵準備未完以前，決以優勢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東積極攻勢，並以有力部隊由豐鎮進至興和遮斷匪南北兩路之連絡，迅速撲滅匪軍，以絕其佔領綏遠之企圖。若此時徘徊莫定，坐令匪勢龐大，交通完成，則我處被動地位，終陷不利也。

他希望「於一星期內出擊，則不致失機，再遲恐反被攻矣。」可見蔣委員長有發動攻勢之決心，不過他也強調「追擊不必過遠，至綏察邊境即可停止，或追擊到察邊後即行退回綏境原防。」<sup>(47)</sup>蓋不希望擴大戰事，引發中日兩國之間的全面衝突。

11月中旬偽蒙軍隊進攻紅格爾圖，此時外交部長張群正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進行所謂「調整外交」的談判，不過蔣委員長仍於16日指示閻錫山，要其「即令傅主席向百靈廟積極佔領；對商都亦可相機進取。對外交決無顧慮，不必猶豫。」17日蔣委員長指示張群，要他向日人重申「我軍以保護主權與領土之職責所在，決不容蒙偽匪部存在察省之內，自當不顧一切，對蒙偽匪部抱定澈底消滅之決心。」18日外交部奉令通知川越茂，停止中日間「調整國交」的談判。19日蔣委員長再度指示閻錫山：「我軍出擊日期愈快愈好，空軍約三日內即可在洛準備完畢，隨時可以候令飛綏作戰。」當傅軍續攻百靈廟時，蔣委員長甚為關心戰況進展，除「盡量集結兵力準備一切。」並命戴笠將所獲日偽最新情報，「速轉閻傅請注意。」外交部長張群則於28日針對關東軍及偽滿外交部之談話，發表嚴正聲明：「此次蒙偽匪軍大舉犯綏

<sup>(47)</sup>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頁677-8。

，政府負有保衛疆土，戡亂安民之責，不問其背景與作用如何，自應予以痛勦，此為任何主權國家應有之行為，第三者無可得非手打擊偽蒙之獨立。

中共另一個論點，是宣稱綏東戰役主要是傅作義所部的功勞，偶爾也會提及晉軍的貢獻。傅軍本為國軍之一部，傅軍立下戰功，國軍與有榮焉，全國同胞也同感興奮，此事本無須多加辯解。不過中共認為「綏東抗戰結束，湯恩伯的13軍，門炳岳的騎七師才先後到達綏遠。」<sup>(48)</sup>甚至說這兩支部隊之進入綏遠，是「迫於人民輿論的壓力，名為支援綏東作戰，實為監視傅作義部。」<sup>(49)</sup>中共如此解釋，顯然是要凸顯所謂中央與地方軍系的矛盾。國民政府時期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本是學界十分關心的主題，但用綏東戰役來為此論題大作文章，頗值得商榷。如前所述，閻錫山允許傅作義隨時調用待命之晉軍；而王靖國和趙承綬兩支晉軍在傅作義指揮下，確有輝煌戰績。至於中央軍是否於戰爭爆發前即已進入綏遠協防之問題，傅作義曾提及在9月18日，中央軍之小砲隊由大隊長高鵬率領，開入綏省。蔣委員長則於10月12日電令13軍和騎七師入綏挺戰。到了十月下旬，13軍派遣之各級參謀十餘人，由89師參謀長吳紹周率領到綏，分赴各地偵察地形。11月8日13軍軍長湯恩伯化妝抵綏，與傅商定作戰方略。11月11日閻錫山頒發之戰鬥序列中，第二項即為「任命湯恩伯為第二路軍司令官，指揮所部13軍，附72師，及砲兵27團。」<sup>(50)</sup>另據

<sup>(48)</sup> 同註45，頁681-2。

<sup>(49)</sup> 潘紀文，「跟上時代的步伐」，傅作義生平，頁46。

<sup>(50)</sup> 劉一平，「傅作義部隊的發展及建設概況」，傅作義生平，頁105。

<sup>(51)</sup> 傅作義，「綏戰經過評記」，綏遠抗戰，頁4。

當時在13軍擔任旅長的石覺回憶說，13軍於25年初冬由陝北經晉北出塞，越過綏遠涼城、香火地、卓資山，鎮守綏東，是時綏東情勢危急，不過13軍並未參與戰鬥，只是立即接替集寧、豐鎮等地防務，一直與察西商都、尚義正面敵軍對峙，監視其行動，傅作義遂可集中兵力進攻百靈廟。<sup>(52)</sup>由此看來，13軍在綏東戰役之前，應已抵達綏遠協防。

傅作義本人可算是民國以來的一員猛將，民國16年之固守涿州，獲國民政府嘉獎電：「彌足聲威，立功殊偉。」22年率35軍赴長城抗擊日本侵略，懷柔一戰，遠近馳名。是故25年12月23日百靈廟激戰之時，蔣委員長致電傅作義：「即使偽軍增加，亦不足為慮，吾兄智勇必能如計完成也。」<sup>(53)</sup>表示他肯定傅作義的能力。其實在綏東戰役爆發之前約三個月內，美國駐華軍事武官對中央是否派軍入綏協防之事，就十分關切。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認為只要傅作義和閻錫山能掌握綏遠形勢，蔣委員長不可能再多派軍隊前往綏遠。<sup>(54)</sup>隨著綏遠局勢的日漸緊張，中央軍入綏之傳言也時有所聞，但美國駐華武官對此傳聞一直表示懷疑。<sup>(55)</sup>然而史迪威發表的「11月22日至26日情勢報告」中，提到：「武官處所雇用的一名華籍職員，於11月24日自大同報告，數支中央軍已經到達綏遠和山西，此人之報告一向可靠。」<sup>(56)</sup>此後之「情勢報告」中，再也不見美國武官對中央軍派遣入綏懷疑之詞句。因此中央軍在綏東戰役進行時，已然駐守綏遠境內，協同抗敵，此事殆無疑問。不僅如此，閻錫山擔心暉會以正式軍隊加入作戰，特於23日懇求蔣委員長「再備五萬人駐紮相當

<sup>(52)</sup> 陳存恭、張力訪問，張力記錄，石覺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5年2月），頁82-3。

<sup>(53)</sup>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頁682。

<sup>(54)</sup> USMIR, China 1911-1941, Reel 10, No. 0444, p. 5.

<sup>(55)</sup> Ibid., Reel 10, No. 0470, p. 2.